

存在论视角下的人工智能文学再论

段梦婕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DOI:10.61369/HASS.2025050009

摘 要： 人工智能文学作为一种新兴文学形态，在后人类语境中引发了关于文学主体性、时间性和技术本质的深刻反思。本文尝试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人工智能文学的意义与价值。本文探讨了人工智能文学作为意义生成场域的功能，通过新读者的核心作用强调此在的优先性；分析了人工智能文学作为此在镜像的特征，揭示了其表面化时间性与此在时间性的本质区别；结合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探讨了人工智能文学作为技术本质对此在解蔽的实现，指出其在异化空间中为人类提供了反思自身独特性的契机。

关 键 词： 人工智能；海德格尔存在论；此在；解蔽

A Reexamination of AI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Duan Mengji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Abstract： As an emerging literary form, AI-generated literature has provoked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literary subjectivity, temporality, and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within the posthuman contex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examine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AI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ideggerian ontology. It explores the function of AI literature as a field of meaning-generation, emphasizing the primacy of Dasein through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new reader; 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I literature as a mirror of Dasein, revealing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its superficial temporality and the authentic temporality of Dasein; and, drawing on Heidegger'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t discusses how the technological essence of AI literature contributes to the unconcealment of Dasein, offering a moment for human beings to reflect on their own uniqueness within an alienated space.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ideggerian ontology; dasein; unconcealment

引言

包括人工智能文学在内的数字文学是在数字新媒介的催动之下，自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种因媒介变革而兴起的文学样式，目前在国内外都已获得长足发展。^[1] 最早的机器文学可以追溯到 1959 年由德国计算机科学家卢茨使用楚泽 Z22 (Zuse Z22) 大型计算机开发的机器作诗程序“随机文本”(Stochastische Texte) 生成的文本。^[2] 经过半个多世纪，机器文学不断升级，在当下成为了极具生命力的新形态。2023 年，Open AI 公司开发的 Chat GPT 问世，其在文学性文本生成实践上的表现比前期国内取得的相关成果更加令人惊艳，引起了学界对人工智能文学关注的又一波热潮。2025 年 1 月，深度求索公司出品的 Deepseek 在国内市场免费提供服务，其生成的文本在文学性上的优秀表现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某种意义上映照后人类语境的不不断切近，后人类主义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逐渐在西方文学理论中被建构和不断丰富，旨在对人类文明以及人类自身理解的反思性重构^[3]。在这样的语境下，曾经作为人所特有的精神生产活动的文学，也亟须给予新的观照。后人类语境中主体身份的泛化提示着我们各种实践活动中主体多样化的无限可能，正如美国后人类主义理论家 N. 凯瑟琳·海耶斯所说，“无论后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它都标志着人类可以将自己视为统治地球的有特权的理性存在的时代的终结。如今，渗透于人类社会基础设施之中的复杂的人类技术系统，指向了一种更为谦逊也更精确的图景：人类只是众多认知者当中的一种”^[4]。人工智能文学作为一种可能的文学新形态，在分析其可定义性时不能以传统文学观念中文学活动的主体身份为唯一标准。随着理论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学活动中的人工智能和人类及其相互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人曾经在文学生产活动中的绝对主体性逐渐被消解，与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关系也不再是简单的主客对立，不再是单纯的实践者与工具的关系。Deepseek 步入市场，有了广大的用户，其较为优质的文学文本生成技能获得了大量的实践，不管是学界，还是作为潜在读者的用户都对这一新形式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在这个契机下来重新审视生成式人工智能文学，能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并且有着更坚实的实践可能来检验认识的正确性。

在取消主客对立甚至是取消人本主义主体性的语境下，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可能是我們重新思考人工智能文學的一條新路徑。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在某種意義上試圖超越傳統的主客二元對立來思考存在的意義，思考作為此在的人與世界、世界中其他存在的關係。而人工智能文學恰是與人工智能技術關係下的產物，並且作為特殊的文化產品與人有着重要的聯繫性。此外，海德格爾在《技術的追問》中討論了現代技術對人類生存的深刻影響，對我們分析人工智能文學這一技術性結果有着重要的啟示。

一、作為此在優先性的確證

按照傳統文學理論的基本邏輯，只有具備主體性的“作者”才能開展“創作”活動，故而主體性問題往往是探討人工智能文學需要探究的基礎性理論問題。西方早期的機器文學實驗十分強調文學自身結構生成和對作者主體的抑制，^[4]如果說文本中心主義曾經是極端之言，那麼在機器文學面前，“作者之死”的宣告已經從理論變成了現實。作者這一文學活動的根本性構成要素在一定程度上被取締直接動搖了人在文學創作中的主體性地位。有研究指出，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文學實現的是“一般創作”，無法實現只有人才能進行的“深度創作”，所以人在此類活動中依然保留主體性。^[5]但是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迅速，基於文本效果或是生成方式來討論人在人工智能文學活動中的主體性是有限的，或許放棄對人在文學活動中主體性的執念，尋找更為根本性的立場才是在新語境下正確審視人工智能文學的正確路徑。

海德格爾指出，“此在在存在者層次上及存在論上具有優先地位……它是使一切存在論在存在者層次上及存在論上都得以可能的條件”，^{[6]17}而此在這種存在者的本質就在於它“去存在”，即此在不是同其他存在一樣固定的，而是具有“去存在的種種可能方式”，^{[6]50}粗略地來理解，所謂此在“去存在”的本質就是一種能夠創造無限可能的主動性和能動性。人作為此在的這種本質上的優先性是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世界中的一切其他存在所不具備的，這應該作為我們考察人工智能文學的基本立場。

由於人工智能不具有“去存在”的主動性和能動性，所以人工智能文學在面對此在時成為對此在優先性的確證，表現有兩種，一是作為此在在相應的文學活動中確證文本意義的場域；二是對此在意志的回饋和執行。

在傳統文學理論（指吸收人工智能文學作為文學形態前的文學理論）中，讀者的閱讀對整個文學活動的最終完成具有重要作用，以姚斯和伊瑟爾為代表的接受美學分析了讀者閱讀這一環節實現文本意義的機制，即讀者通過與作品間的視野交融、與文本結構的互動、與作者的交互生成作品的意義。^[7]同時，讀者從文本中獲得情感、哲理與思考，進而獲得對自身存在的確證與認知，實現了文學在認識、教育、審美等層面的價值。

在人工智能文學這一新形態的文學活動中，讀者的這種職能得到了更加突出的表現。由於取消了傳統作者這一主動性的構成要素，所以“讀者”成為這種文學新形態中唯一能發揮主動性“去存在”的要素。從量上來說，這種新讀者在閱讀中對文本的解碼和重建幾乎成為了文本意義和價值的唯一來源；從質上來說，這種新讀者還以“協同作者”的身份參與到文本創作的環節中來，人工智能文學是沒有主動性地對用戶的意志作出回饋和執

行。這種轉變強調了讀者作為“此在”人工智能文學活動中的優先性，更強調了此在在人工智能面前的優先性，不論技術發展到何種地步，這種優先性都應該得到承認，這是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基本倫理要求。

二、作為此在的鏡像

海德格爾指出，此在是通過時間性的展開而展開的，時間性是此在存在的根本結構。“從將來回到自身來，決心就有所當前化地把自身帶入處境。曾在源自將來，其情況是：曾在的將來從自身放出當前。我們把如此這般作為曾在着的有所當前化的將來而統一起來的现象稱作時間性”。^{[6]372}也就是說，曾在、當前以及將來一體化的這個總體就是時間性，而此在就是以這個整體化的時間性為存在方式的。

人工智能文學的生成虽然是即時完成的，但卻不是在封閉的時間點上直接實現的，而是置於曾在、當下與將來相互關聯的開放維度中，一定程度上具有時間性的結構特徵。人工智能文學基於當前的技術水平和數據進行即時性的文本生成，通過模仿歷史文本、文化數據中的文本結構、語言風格等進行拼貼，將一種復生的歷史影像嵌入到文本中，並通過預測性地建構未來可能性而表現出一種將來維度的指向。

但是人工智能文學的這種時間性結構事實上是極度表面化的，因為它對歷史文本和文化數據的學習分析和運用只是模仿和拼貼，文本中的“歷史感”來源於模式化的再現行為，只是一種表面影像而不具有深度特徵，與此在所有的歷史性經驗有着根本的區別；對未來的想象和預測指向物理時間的維度而不具有“向死而生”般朝向未來展開的能動特徵，從而也就無法指向本真。

人工智能文學的時間性結構沒有內在維度，甚至上浮到了物理時間的層面，不具有此在時間性結構的深度、連貫性和延展性。但它又確實具有一種當下的開放性，並使此在能夠在其中展開自己的時間性。人工智能文學與此在這種性質上不同而表面上相似的關係可以比喻為一種特殊的鏡像關係，即在面對鏡子時，人可以从鏡像中看到自身的影像並且對自身形成某種認知，但是當人走近鏡子時，鏡像却由於不具有內在時間的可延展性而靜止不動。

人工智能文學自身具有表面化的總體時間性特徵，在結構上與此在具有相似性，並且在即時的閱讀過程中，由於文本語料與此在經驗的同源、文本作為符號的特性以及閱讀中的接受機制等因素的作用，讀者可以對相應文本實現歷史的賦語境化 and 對自身的內在認識，這種閱讀實踐也可以作為此在的開放和動態的時間性結構。這是人工智能文學作為此在鏡像的相似性前提，以及它

所具有的帮助此在形成对自身认识的功能性前提。

但人工智能文学以模仿和拼贴为基本实现手段，总体上具有去深度化、去历史化、去语境化的特征，形态上是二维的平面影像，与立体实在的此在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更为重要的是，此在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中延展并且在时间性中展开自身的存在，而人工智能文学作为影像却无法实现这一维度上的动态效果。

三、作为技术本质对此在的解蔽

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指出，“技术的本质乃是一种解蔽的方式”，^{[8]931}“我们要追问技术，并希望借此期待一种与技术的自由关系。当这种关系把我们的此在向技术之本质开启出来时，这种关系便是自由的”，^{[8]924}他认为对技术之本质的追问是在正确的基础上揭示真实，而在这种对真实的揭示中，也就是在对本质的追问中，我们同时能够找寻到作为此在的自由。

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是一种以控制和保障为主要特征的“促逼”的解蔽，随着现代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自然和人都被促逼摆置，进入一种“持存”状态，也即进入一种与此在之存在方式相对的异化状态。在海德格尔未曾面对的后现代甚至后人类时代，人的这种“持存”状态有增无减。詹姆逊在其现代性研究中指出，后现代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试图将一切都吸入到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实现资本主义阶级对大众的意识殖民，^[9]在这种文化逻辑下的人的状态，正如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之促逼的描述，“人类如此明确的处身于座架促逼的后果中，以至于他没有把座架当作一种要求来觉知，以至于他忽视了作为被要求者的自己，从而也不去理会他何以从其本质而来，在一种呼声领域中绽出地生存，因而绝不可能仅仅与自身照面”。^{[8]945}

人工智能文学作为技术，是时代的命运；同时人工智能文学作为镜像，与詹姆逊提到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幻象十分相似，它们具有类似的手段和同样的特征。但无论是作为技术还是意识镜像，人工智能文学没有强制性地使我们陷入它的逻辑之中，而是

给出了一个开放性的解蔽空间。当我们在相应的阅读活动中，先决地或是后发地认识到人工智能文学能生产出与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相当甚至可能是最佳的文本依靠的确是一种非此在的机械活动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异化空间中“定位”自身的契机，因为面对人工智能文学这种非此在主体所实现的与此在高度相似的行为结果，会引起此在对自身独特性的怀疑。“认识给出启发，具有启发作用的认识乃是一种解蔽”。^{[8]931}当此在抱着对自身独特性的怀疑时，恰恰也获得了对自身独特性的确证，因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总是走上一条解蔽的道路，归属于解蔽这一命运领域人才成为自由的”。^{[8]943}

四、结束语

人工智能文学的出现不仅标志着文学形态的革新，更引发了关于人类存在、技术本质和时间性的深刻哲学思考。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视角来看，人工智能文学作为一种技术产物，既是对此在优先性的确证，也是对此在时间性的镜像映射。它通过模仿和拼贴，形成了一个表面化的时间性结构，虽然缺乏深度和历史性，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场域，使其能够在阅读中展开自身的时间性并实现意义的生成。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文学作为技术本质的一种解蔽方式，揭示了现代技术对人类存在的深刻影响，并在异化空间中为人类提供了反思自身独特性的契机。尽管人工智能文学无法完全替代人类文学的深度与创造力，但它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态，无疑为我们重新思考文学、技术与人类存在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本文实际上正是这种思考的尝试。在后人类语境不断切近的当下，人工智能文学不仅是一种技术现象，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在技术时代的自我认知与存在意义。随着技术的不断推进，人工智能将在更多的领域展现出其对人类本质的存在论价值，它将作为“主体外化自身的媒介，为人类反思自我提供新的隐喻”。^[10]

参考文献

- [1] 单小曦. 莱恩·考斯基马的数字文学研究[J]. 文艺理论研究, 2011, (05): 12-21.
- [2] 李睿. 基于语料的新诗技：机器诗歌美学探源[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20, (05): 42-49.
- [3] 郭琳.N. 凯瑟琳·海耶斯的后人类主义理论研究：从数字人文到技术认知[J]. 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2021, (04): 67-72.
- [4] 聂春华. 组合与生成：文学机器的谱系及其诗学意义[J]. 文学评论, 2025, (01): 171-181.
- [5] 简圣宇. 生成式人工智能文艺创作的主体性问题[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4(01): 85-97.
- [6] [德]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合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12.
- [7] 任卫东. 西方文论关键词：接受美学[J]. 外国文学, 2022, (04): 108-118.
- [8] [德]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M]. 孙周兴, 选编.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 [9] [美] 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张旭东, 编. 陈清侨, 严锋,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3.
- [10] 郝婉莹. 人工智能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和影响[J]. 百科知识, 2022, (15): 15-16.